

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李在全 游海华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未终结,而是在大后方进行,平教会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一例。此间的平教会在湖南、四川等地开展了许多的乡村建设活动,梳理和考察这些活动,可以审视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境况下,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互动与影响,并探讨抗战时期民间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及对双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审和反思了目前学术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的既有结论。

关键词 乡村建设运动 平教会 抗战时期 晏阳初

清季以降之中国社会,史家陈寅恪谓之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①在此期间,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组织乃至个人,凭着各自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历史进程。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建设者们,基于他们对中国乡村和国情的体认,掀起了一场颇具规模和声势的乡村建设运动,以今天的历史后见之明观之,可视其为一场促进中国转型的尝试和探索。在审视这场运动时,晏阳初和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我们无法绕越的典型个案。学界对晏阳初和平教会的

^①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载《陈寅恪集·诗集(附唐 诗存)》,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页。

研究,可以说是相当深入,硕果累累。^①但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抗战之前的定县实验阶段,并认为抗战爆发以后,乡村建设运动陷于停滞、失败的境地,趋于终结。其实,抗战爆发之后,平教会还在许多地方进行过乡村建设活动——它似乎被抗战洪流所掩盖或遮蔽,对此,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对其在抗战爆发以后的活动略做考察和探讨。

—

平教会成立于1923年8月,总部设在北平,晏阳初是主要领导人。1926年开始选河北定县为实验场,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1935年以后,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华北危机日剧,在这种情况下,平教会于1935年下半年开始,调整工作计划,一方面继

① 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岳麓书社2001年版); Charles W. Hayford: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四川省政协、巴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四川出版社1990年版; 詹一之、李国音:《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宋恩荣、熊贤君:《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论文则更多,其中与本文有较强相关的有蒋伟国:《抗战时期平教会的农民抗战教育》,载《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宋恩荣:《晏阳初对中国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的思考》,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2期; 张彬、李更生:《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先声——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再认识》,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徐秀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 杜俊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平民教育运动——以新都实验县为中心》,四川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暨爱民:《抗战时期湖南教育发展述论》,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1期,等等。感谢宋恩荣、詹一之等人在晏阳初和平教会研究方面所做的基础工作。

续坚持定县实验，“河北一天不变色，绝不放弃定县”，另一方面开始准备将总部和部分工作人员撤到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由于富有特色的乡建理论和多年富有成效的乡建实践，也使许多地方当局，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江西等省当局对平教会的乡村建设甚感兴趣，纷纷发出邀请，请求派人协助他们推进乡村建设工作。从1935年底到1936年初，晏阳初等人到这几省做了考察，考察的结果，认为广西、湖南、四川的条件较为成熟。

以往在论及平教会南撤的原因，大都认为就是华北危机所至，其实，晏阳初和平教会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有条重要逻辑不应被忽视，那就是实验仅是一种表征，其后的推广是其逻辑的必然延续，由一地推广到多地，由县推广到省，再到全国是其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应该说，平教会的南撤是其内在乡建逻辑和当时形势交互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在南撤之前，平教会因各地乡村建设工作的需要，已分别派人前往协助，如江西省三地“农村福利中心”以及省卫生处农村保健科，河南省宛西乡村师范学校，江苏江宁实验县，浙江兰溪实验县，山东邹平实验县，陕西华县乡村保健工作，绥远包头教育与生计训练的实验，广东中山模范县的教育工作等，都是“定县实验”向各地的推广。^①1935年底，平教会曾准备向广西作有计划扩展，但后因“两广事件”而搁浅。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四川、江西、贵州、广西等地都开展过活动，其中最主要的省份是湖南和四川。

缘何选择湖南、四川？大体而言，原因有三：其一，湖南、四川

^① Auchincloss, Ellen ed.: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in China; 1929- 1939. A Constructive Decade* (July, 1939. Manuscript) P. 74, 转自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80页。

的地理位置重要。尤其是四川,晏阳初认为:“四川在整个国家的地位太重要,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不去做……现在仅剩的抗战基地,人力物力都还充足的,已无几省,而四川乃是这几省最大最重要的一个”。^① 1936 年 6 月,平教会总部南迁长沙,在面临着沦陷威胁后,于 1940 年春,又迁往四川。其二,湖南、四川曾是平教会开展平民教育的重要省份,有着良好的基础。早年的平教会第一个选定的地区是湖南的长沙,“长沙的平民学校 4 个月毕业,第一期毕业的学生计 956 人,学生年龄从 14 岁到 58 岁,代表着 52 种不同的职业……几年后,长沙一地的平民受过识字教育的,有 20 万之多”。^② 在四川,很早就有平教会活动,例如,1933 年 4 月,四川江津县平教实验区筹备处成立,随即征集平教会会员,筹经费,草拟工作计划,10 月,江津实验区正式成立。^③ 此外,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卢作孚(曾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在重庆北碚等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乡村建设实验。其三,当时湖南、四川省政府与平教会有着良好的交往和合作意向。1932 年,时任湖南省府主席的何健曾派秘书长及湘潭县长前往定县考察工作,回湘后建议设立湖南省县政研究院及实验县,并拟邀请陈筑山来主持,后因财政和政治上的原因未能实现,但双方继续保持联系。四川方面,平教会领导人晏阳初、傅葆琛等人就是川籍人士,但长期以来,对四川武人相争、川政混乱、民生艰难多有不满。到 1935 年,四川地方政局稍靖,时任四川省府主席的刘湘邀请晏阳初协助四川的建设工作。1936 年春,晏阳初等人前往成都,与省府要员进行了较为详细和

① 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3—124 页。

② 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载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59—260 页。

③ 四川平教会江津实验区泸溪季刊编委会:《泸溪季刊》,第二、三期合刊,第 13 页。

满意的会谈。当时刘湘卧病在床,但在晏阳初等人将离川北返前夕,刘湘坚持扶病亲自与晏面谈一次,此事让晏深为感动,刘湘同意平教会提议的基于统筹全省建设需要而设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的计划,刘为委员长,并推荐晏出任副委员长,实际主持工作。^①

二

1936年2月,晏阳初等人应邀南下,与何健及湖南当局其他相关人员商量,达成了共识:决定设立“湖南省实验县政委员会”,省政府委员及四厅长与平教会的晏阳初、瞿菊农、彭一湖三人组成(当时已经预定彭一湖出任实验县县长),一切相关的问题在此委员会中讨论,议决后交付实行;省政府还决定在县预算经费外另增拨10万元供实验县使用;另拨6000元作乡村人员训练用,2.4万元作新设立乡村师范一所的经常费,所有校务由平教会推荐的人员主持。^②1936年6月,平教会总部南迁湖南长沙,平教会在湖南的乡建工作全面展开:

(一) 衡山实验县

经过多方筹备后,1936年7月,衡山实验县正式成立,平教会重要骨干人员彭一湖就任实验县县长。该实验县主要举措如下:

行政体制方面。在县级政府中,推行以“撤局改科”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县政府设秘书长,辅佐县长工作,下设四科。原公安局

^① Yen, James: letter to Mr. Gunn (Ting Hsien, China, March 31, 1936) CAN, MEM: Annual Reports 1935 to 1941, pp. 28-34. 转自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85页。

^② 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83页。

由一科接管,原财税业务由二科接管,原合作指导办业务由三科接管,原教育局业务由四科接管。原承审室撤销,设立衡山地方法院,由省高等法院直辖。1937 年初,县政府设秘书、统计、督导 3 室和一、二、三、四科,共计官员 62 人。是年秋,增设兵役科和“抗战后援会”。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推行以“撤区并乡”为主要举措的建设方案。全县设 55 乡,2 镇,1937 年 5 月,再次调整为 26 乡,2 镇,下辖 495 保,8387 甲。乡镇置乡镇长 1 人,总务、教育干事各 1 人,公丁 2 人。^①

整顿地方财政和教育方面。衡山实验县行政经费预算,每个月为 4738 元,除原有经费 2000 元之外,不敷 2738 元,由省政府补助。同时,县政委员会决定“地方财政统收统支”,其好处是:减少征收费用,便于统筹支配及调剂盈虚,便于稽核,便于统计及整理。^② 1936 年 8 月,县政府考选小学教员 600 人,地方自治人员 70 人,并借县立中学进行短期培训。湖南省府主席何健及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晏阳初、瞿菊农先后到训练班讲话。平民教育也有所成就,基本上完成一保一所国民小学,一乡一所中心国民小学的设置,另办民众夜校近 300 班。^③

面对日本的入侵,平教会对成员普遍认识到国防自卫工作的重要性。县政府除积极整顿全县义勇队和警察外,1936 年 10 月,调查全县壮丁数量,并上报县政府,成立社会军事训练总部队,考送干部前往省第五区司令部受训,结业回县里后,又补充国术训练两周,分别派往各乡镇工作。

①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 1994 年版,第 20、199、200 页。

② 詹一之、李国音:《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227 页。

③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 1994 年版,第 20、3 页。

此外,衡山县政府为将各项建设事业,作一综合表征以供观摩,于1937年2月,特别指定师古乡为农村改造示范区,聘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汪德亮为示范区主任。彭一湖主持衡山一年,后因病去职,由孙伏园继任。^①衡山实验县的举措与定县实验县相比,除继续在教育方面推进,在促使行政改革和整合社会资源能力方面甚为明显。

(二) 创办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

在国难日艰的情况下,为培养乡村人才,平教会于1936年10月在湖南衡山创办了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由平教会重要干部汪德亮担任校长。该校:“以培养乡村小学师资及农村改造民众教育实施人才为宗旨”,把培养具备乡村教师和乡村工作骨干双重能力的人才作为首要任务,即在课堂上是一名优秀教师,在村务会议上是一位活跃有力的领导人。因此,对生源要求是:“初中毕业、熟悉乡村情形及农民生活,志愿终生在乡村服务,身体强健能吃苦耐劳者”。

从招生和课程设置来看,该校的乡村建设旨向十分明显。学校课程的中心主题是乡村改造,与衡山实验县计划的乡村改造工作,有着直接而密切的配合。计分6类:社会调查;军事训练及自卫;民众教育与民众组织;乡村学校;农业;乡村改造活动(包含合作社、乡村卫生、村民所等)。可以说是所有课程是为达到既定的目的而设置的,也是平教会多年的乡村工作的实际经验与心得,又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因地制宜而设置的,显示了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

从学校教学方法和校风来看,学生们虽然一样地学习科学、作

^① 詹一之、李国音:《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第227—229页。

诗文,但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许多知识原理,并不用口授,而是动手去做,由“做”中去求认识;由“做”中得经验;由“做”中形成技能,并验证所学的功课。学生们的饮食粗砺,衣着朴素、居室简陋,和一般农民生活一样。学生每天早晨六时举行升旗礼。他们不仅要会抬土,会撑船,会拟建设计划,还要会救人。衡山乡师的教员饮食起居服装和学生一样。

在非常的战争时期,衡山乡师特别重视对学生的军事管理和训练。全校编为一个大队,每班为一区队,班有分为三个分队,区队长,分队长都是学生轮流担任。军事教官任大队长。这种组织并不限于操场,日常一切生活如上课及三餐饮食都排队进入。学习生活军事化,纪律严格。这所在烽火中诞生的学校,在战火中几经迁移,即是后来的湖南省武冈师范学校。^①

(三) 开展农民抗战教育

素以教育广大农民为职志的平教会,面对抗战的时局,认为:“我们这次抗战,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条件是能持久,而抗战能否持久,不单靠前方的武装同志之力,更须后方的充实……而全民族中最具坚韧最富潜伏力,足负起长期抗战的使命的,莫过于三万万农民,所以这次战争的胜败,实在系于农民抗战的有无办法。”“我们多年从事农村运动的人,在农村建设及县政改革的研究实验中,得了一些农民教育的经验,在这个民族生命存亡继绝的关头,我们责无旁贷,现在着手于农民抗战教育团之组织,集合一般甘愿献身农村工作的同志同道,深入民间,去提高农民的民族意识,增进农民的抗战力量,使整个农村,在精神物质两方面,都能为

^① 湖南省武冈师范学校主编:《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9—82页。

前方将士强有力的后盾”。^①

1937年11月6日,农民抗战教育团第一届训练团员讲习会在长沙文昌阁66号平教会所在地举行,学员主要是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撤退到湖南的大学生。经过近两周的短期训练,讲习会于11月18日结束。接着,平教会按照每个团员的专长将其编成6队,由平教会人员带领,“巡回湘潭等12县,实施国防精神教育及战时经济指导、救护训练等项工作”。农民抗战教育团宣传民众的工作,既教育了多数民众,又给予了参与其事的知识青年以切身的影晌。在事过40年后,亲身参加过教育团的老人回忆道:“这一段时间多姿多彩,在我生命史上很精彩。我相信对于其他的队员也一样。”“我们这样在大城市里长大的知识青年得以深入农村,认识自己国家的真面貌,是十分实际的教育”。平教会以后又继续多次举办过教育团,并将得到基础训练的团员分期分批送往湖南的75个县,发挥其在民众教育中的作用。^②

(四) 训练地方行政干部

抗战以来,湖南地方当局逐渐认识到:只有各级政府本身执政能力的提高,才能领导和驾驭民众力量进行抗战。为此,湖南省当局与晏阳初等人商量后,决定把在定县及衡山行之有效的制度普及全省,设立地方行政干部学校,训练新县长、乡镇长等地方行政人员。

1938年4月1日,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开学,晏阳初应邀担任教育长,平教会许多重要人员分别担任了部门要职。第一期学员2500人,第二期学员1500人,都是经过甄试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或县级现职人员。每期训练期为6周。晏阳初等平教会人员与

① 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

② 蒋伟国:《抗战时期平教会的农民抗战教育》,载《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各学员共同起居作息, 讲授课程之余, 找学员个别谈话。7 月 25 日, 第二期学期结业, 随即由省政府分派工作, 湖南 75 个县的县长和县佐人员大多从这两期学员中任命。10 月 1 日, 第三期学员 1000 人开学, 训练期间延长至 8 周, 这是适应县境较大、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大县, 例如衡阳、邵阳等县的需要。

保长是接近民众的基层工作人员, 事关民众权利义务甚大, 战时尤其如此, 因此, 保长是否负责胜任关系重大。鉴于此, 平教会又协助省政府计划训练全省各县保长 4 万余人, 自 1938 年 9 月 15 日起, 分别在 9 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 分期召集所属保长训练, 年底完成。

另外, 各县原有的区公所一律裁撤, 另设县政督导员, 流动巡视, 指导并监督乡镇长, 整合乡镇区域。又依照《各乡保民众集体组织办法》, 各乡镇设立评议会, 每 3 个月集会一次, 每半年举行乡镇民大会一次。各保每月举行保务会一次, 3 个月召集保民大会一次。^① 湖南省各县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及人员“革新”基本上完成。

此外, 平教会还在湘西的泸溪等地进行乡村建设活动, “平民教育创办人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迁来泸。该会在泸溪出版平民报, 协助县政府制定民众教育计划”。^② 并创建图书室, 培训全县小学教师和城区甲长, 开展难民教育等。^③

虽然许多措施停留在表层, 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但在短期内对全省地方行政人员的大规模培训和“输血”, 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 也是平教会运思多年的“省单位实验”理论及计

① 吴相湘:《晏阳初传》, 岳麓书社 2001 年版, 第 312—313 页。

② 《泸溪县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01 页。

③ 平教会驻泸办事处编印:《在泸溪》, 1939 年 7 月, 第 62—65 页, 国家图书馆藏书。

划的预演。

三

四川方面, 1936年春平教会和四川省政府的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设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和开展全省调查工作

1936年10月, 四川省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宗旨为: 谋取全省行政之科学化增进行政效率, 其职权如下: 根据中央及本省之各项政策, 拟制省内各项事业之具体方案; 审议省政府交议之各项方案; 视察并研究各项政务有关系技术之设施; 办理省政府核准试办之各种表征设计; 计划省政府各厅处工作进行上之联系与调查。此外还规定: 本委员会为应省政府各厅处之需要, 得派员襄助各项计划之实施; 本委员会于研究所得, 得向主席建议, 经省务会议议决后, 交各主管机关实行。但认为有须自行实验者, 得由主席划定一事或一地, 交其直接办理, 其规程及预算临时另定之。^①

面对千头万绪的情势, 平教会认为, 首先应进行全省社会调查。该项工作由傅葆琛负责, 组建调查团, 并制定了《四川省政府调查团工作大纲》。按《工作大纲》规定, 社会调查方法分二项: 集中调查: 即于一县境内作集中的详密调查; 抽样调查: 在四川的川南、川东、川西北等地, 各选若干地方加以调查。社会调查工作于是年11月展开, 傅葆琛以调查团团团长兼第二组主任, 先后在新都县做县单位的集中调查两个月, 再到川南、川东、川西南一带, 去做抽样的概况调查。他在26县及重庆市做过概况调查, 没有做调查但足迹到过的共16县, 合计42个县1个市。“集中调查, 只选了

^① 吴相湘:《晏阳初传》, 岳麓书社2001年版, 第298页。

新都一县(其实当时已经预定为将来的实验县),由1936年11月初至12月底,费了两个月的工夫。抽样调查,共选了20余县,由1937年1月中旬起,至4月上旬止,共费了3个月工夫”。^①这样全省规模的社会调查,对于了解省情,科学地制定计划和开展工作,实属必要。

(二) 新都实验县

1937年4月,四川省政府定新都为实验县^②,直隶省政府,陈开泗任实验县县长。实验计划3年完成。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开展实验和建设:^③

改革县议事机关,将原县政府的18个委员会改组为县政咨询委员会。行政机关方面,裁撤原有各局,设民、财、教、建4科。主办财政的,以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生为主;主办教育、建设的,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的骨干为主;新都改司法室为司法处,增设军法室,县长兼司法行政及检察官、军法官职务。对县以下行政机构,裁撤5个区署,设5个县政指导员,巡视各乡镇。14个联保办公处,改为乡(镇)公所,下设民政、警卫两股。基层保甲方面,改原10进制编组为以自然环境、历史关系编组,整编后,较前减少117保、1297甲。改保民大会为户长会议,乡(镇)民代表由各保户长推代表1人组成。

警政治安和财政税收方面。实行警卫合一制度。将原来县政府警佐室、县自卫总部、民防指挥部改组为县警卫处,统管全县警卫。原先省派两个保安中队驻县,县每年上缴保安费5万银元,实

① 《教育半月刊》(四川版),第3卷第3—4期,1937年5月。

② 当时的新都与现在新都有区别,现在的新都是1965年3月由新都与新繁合并而成。

③ 以下资料和数据根据《新都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1页整理而成。

验县裁并省保安中队,以其人员和原上缴的保安费,成立1个武装警卫队,直属县警卫处和县长指挥。划全县为5个警卫区,分区设区警卫所,保设义勇警卫员。新都原先的田赋征收十分混乱,实验县设土地清丈处,清丈全县土地,登记地籍。原来县政府的经费开支、审核由县长负责,办一事报销一次,全年收支无总帐可查,弊端丛生。实验县设县金库,统管全县收支,定期编制预决算,提请县政咨询委员会审查通过,报省核准执行或备案,在四川,此举为首创。

教育卫生和改良农业方面。原来县内小学集中在县城及各集镇,农村儿童入学不便。实验县在保设初级小学,乡镇设高级小学,县城设中学。规定学龄儿童必须入学,不收学费,免费供给课本。实行以乡保划分学区,分别设学校的制度后,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0%以上。这种制度,后被国民政府令行全国。创设县卫生院,设病床30间,开展内外科门诊医疗,并管理全县卫生行政。设4个区级卫生所,开展门诊、预防、接生并指导各保卫生工作,各保设卫生员。这套公共卫生办法,首开全省先例。设县农场和家畜保育场,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川大农业改进所合作,推广优良品种。

新都各项工作的开展,使社会经济多方面都有起色,“人才既美满,经费又充足,而权力又复集中,当时之新政,颇觉可观”。^①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1月刘湘病故,省政一度动荡。1938年10月,实验县实施新的兵役制度:“壮丁抽签,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消息传开,反对实验县的各种势力,如哥老会首和地方土豪劣绅等百般抵制。11月9日,新都及附近的金堂广汉新繁简阳等8县袍哥和团丁数千人聚集新都,武装包围新都县城,部分乡区发生砸毁联保办事处乡公所,烧毁档案,打死督导员、农技员,火焚教育

^① 新都县政府统计室编:《四川新都县概况》,1943年11月,第12页,国家图书馆藏书。

区,捣毁县农场,毁坏试验作物等事件。川康绥靖公署和省政府在使用镇压和安抚手段后,顾及抗战全局,基本上答应围城哥老会和团队提出的要求:停止征兵,撤销乡村警察,取消实验县及其他各项设施,撤换县长等后,平息了这次事件。事后,对此次事件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受到处分,实验县县长陈开泗受撤职记过处分。次年5月,省政府撤销新都实验县,恢复普通县建制。^①

(三) 协助实施“新县制”和“行政督察区”实验

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通称“新县制”),其中采纳了许多平教会多年以来在定县、衡山、新都等地实验积累起来的经验。基于四川的特殊情况和在抗战中重要的地位,国民政府决定在四川率先实施,要求平教会协助。

国民政府指定四川全省各县于1940年3月1日,实行新县制,并规定第一年内应该完成下列工作:充实县政府;裁撤区署;改组乡镇公所,完备乡镇中心小学及乡镇壮丁队,甄训保长。经中央会同省政府共同筹划,如期实行。1940年4月底,各县行政机构调整完成,5月1日开始训练工作,全川地方行政人员分期分别至省训练团地方干部训练班或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举办的训练班受训,借以了解新县制精神。同时,四川省政府制定《普设乡(镇)中心学校及保国民学校实施办法》,规定自1940年8月至1943年7月,分3年普遍设立,预定第一年終了,学龄儿童有90%以上入学,失学民众有60%以上入学,第三年終了,每保平均至少有初小一班,初级成人一班,扫除文盲目标即可达成。^②

四川首先实施新县制,树全国县政改革之先声,意义重大。然而,晏阳初等人在多年的“县单位”实验探索中,一直试图做进一步

① 《新都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② 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17页。

的“省实验”，本来有意在湖南试行，但由于日寇的进犯，无法推行。平教会总部迁到成都后，决定在四川推行“省实验”，但四川省域广阔，人口众多，社会情况复杂，为方便推行，决定先进行“行政督察区单位”实验：其所辖控制在七、八县，人口约三四百万，范围比省小，较县大，并认为进行这种实验研究比县单位实验更经济有效。多方协商后，四川省政府特指定第七行政督察区作南部代表、第十一行政督察区为北部代表、第一行政督察区作中部代表的实验研究地域，与平教会合作进行。抗战后著名的“华西实验区”就以这些实验区为基础而形成的。

(四) 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

晏阳初等人在从事乡村建设活动的过程，深切体认到乡建人才的缺乏，早在1936年，在定县就创办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因抗战爆发而停办，但试图创办一所专门培养乡建人才学院的努力却从未放弃。1940年春，晏阳初邀集支持平民教育运动的各方要人，组成校董会，推张群为董事长，晏阳初为董事会秘书并兼任院长。校址选定在重庆北碚歇马场大磨滩龙凤溪畔。“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送教育部请求立案，批准为初级学院。1945年正式准许扩充为独立学院，改名为“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该院1940年夏开始招生，对象是高中(中专)毕业后有一年到两年工作经验的青年。当时学校只设乡村教育和农业两个专修科。1940年10月28日，育才院开学，晏阳初指出：“育才院之创立，乃平教会同仁20年来之夙愿，而在抗战第四个年头正式成立，尤具有深刻远大之意义。盖凡为‘力’之世界，而‘力’之最大最基本者，厥惟‘民力’……因此，遂不得不于此种千辛万苦之环境中毅然创办育才院，为国家社会培养大批乡建人才，以为争取最后胜利建设新中国之主力军。‘育才’之目标是：(一) 劳动者的体力；(二) 专门家的知能；(三) 教育家的态度；(四) 科学家的头脑；(五)

创造者的气魄；(六) 宗教家的精神。”^①

办好育才院是当时平教会的重要工作,得到四川省政府、国民政府社会部、四川银行界的经济支持,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也给予定期补助,并以其中每年资助的购书费从美国选购新出书刊寄给育才院。1942年秋,除原有教育、农业两专修科外,增加农田水利、社会两个专修科,招收新生60人(其中女生7人)。1943年秋,学校学生人数达122人,包括一年级76人(其中女生10人),二年级46人(其中女生6人)。1944年招收专修科新生107人(其中女生14人),教育35人,农业21人,社会26人,水利25人。育才院各专修科为两年制。1942—1945年毕业生人数,据不完全统计为115人(其中女生14人),包括教育45人,社会17人,农业36人,水利17人。毕业生除少数留校任助教或自己要求另找工作之外,大部分到璧山实验县(后扩大为平教会华西实验区)工作。1945年秋改为学院之初,学校有8个班,共计学生183人(包括专修科旧生改读本科二年级生67人),其中女生37人。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各项工作步入轨道,学校的师资力量逐步增强,到1945年秋,有教授15人,副教授7人,讲师15人,助教4人,共计教师41人。1945年8月,有关部门批准育才院扩建为独立学院,设乡村教育学、社会学、农学、农田水利学四个系,修业年限为4年,并获准该院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②战后,乡村建设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此外,平教会在江西、贵州、广西等地也开展工作,例如,应江

① 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② 以上数据引自谭重威:《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校史简介》,载四川省政协、巴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四川出版社1990年版,第93—95页。

西省政府邀请,前往协助设立江西行政干部学校。前定县实验县第一科科长梁振超受任为江西遂川实验县县长。前定县县长霍六丁被任命为江西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等等。

四

以上是对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四川等地乡建活动的简要梳理和考察,然而,乡建运动到底对中国的抗战和社会经济起到了什么作用?是更值得研究的问题。

平教会的乡村建设运动,促进了实验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的改良,支持了抗战,于民族和国家有利,这是不可否认的。“民国25年,衡山县被国民政府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相继采取若干较为开明的政治、经济措施……是年,县政府的农事实验场推广农作物新品种,传授栽培新技术,全县稻谷亩产206公斤,创历史最高记录。平民教育也略有成效,基本上完成一保一所国民小学,一乡一所中心小学的设置。另办民众夜校近300班”。^①1939年至1942年,日军三次进攻长沙均告失败,也与该地方的民众抗战教育和乡村建设有关。当时该战区司令薛岳运用向后退军战略,民众有出力将各种道路破坏,田间也灌水,日军车辆不能行驶,即使武装官兵步行都很困难。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吴相湘,了解实情,留有文字记载,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的谢扶雅也认为长沙的三次大捷与平教会在湖南训练民众的影响有关。^②此外,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历时6个月的四川全省规模的调查,对于了解省情大有裨益,被誉为实证地研究中国社会的创举。

① 《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页。

② 参见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12—323、299页。

另以一项对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毕业学生的追踪调查为例,来说明平教会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1985 年对育才院 132 位毕业生的调查:乡村教育系 36 人中,担任大学教授的 2 人、副教授 2 人,讲师 4 人,中学校长、教师 8 人,任总编辑、编辑的 2 人,党政机关处级以上干部 11 人,其他 7 人。社会学系 30 人中,有教授、研究员 2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 2 人,讲师 1 人,总编辑、主编 2 人,中专及中学校长 6 人,中学教师 2 人,党政机关处级以上干部 12 人,其他 3 人。农学系 24 人中,有高校党委书记 1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 6 人,高级农艺师、农艺师 10 人,中专及中学党委书记、教师 6 人,其他 1 人。农田水利系 24 人,有副教授 3 人,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 11 人,工程师 10 人,中专教师 7 人,水利机关处级以上干部 11 人。^①从以上不完全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毕业生,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②

早期的平教会主要以平民教育为手段,改造社会,后来在实践中,改造的手段在提升,改造的范围也不断扩展,这点在抗战时期表现得很明显。可以说,平教会与政府的紧密配合,是抗战时期平教会与此前相比而凸现的一个显著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境况下,探讨乡村建设运动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和对双方的影响问题。^③

① 参见《西南师范大学史稿》附录部分,重庆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当然,将这些乡建成果置于整个国家中,其分量和影响的是有限的,这些乡建内容,如文字下乡、民众教育等有多少能在当时乡土社会中存留下来并进而推动以后发展,都是值得审视的问题(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文字下乡”部分和徐秀丽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对此有过论说),所以,对乡村建设运动绩效也不宜估计过高。

③ 关于乡建团体与当时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个复杂和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此仅就抗战时期政府与平教会的关系,作简要的个案分析。

从平教会方面来说,试图保持民间学术团体的独立性,超然于政治之外,一直是平教会的理念,这种理念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是晏阳初等人一直坚持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实践中,平教会逐渐体认到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并与之合作,意识到:“如欲将研究所得推广出去,非藉政府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由学术的立场去建设农村是由下而上的工作,由政治的立场去建设农村是由上而下的工作。两者必须扣合起来,方可以博收成效……县政建设底意义是在学术与政府打成一片。政治好比骨骼,学术好比血肉。人生决不能仅靠骨骼,也不能单有血肉。前者是组织,后者是内容,套合起来,恰成全璧。政治用学术为根据,方能有真货色,学术用政治为凭藉,方得顺利推行。两者相辅而成,相依为命。换言之,政治须学理化,学术须实施化,上下交行,双方扣合,而后整个人民生活改造之大计才可完成,大众皆成为‘人’的宏愿,才可促其实现。”^①用晏阳初的话简单地说:“本会的工作是站在学术的立场,处超然的地位,不深入政治,但又要对实际政治有帮助。”^②平教会一方面在主观理论上试图保持自己处于独立超然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客观实践中与政府合作,逐步被纳入国民党政治运作的轨道中,后者在抗战中日趋明显。当时平教会的许多骨干到国民政府中任职,乡村建设运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县政建设中,即是例证。这增强了平教会乡村改造的力度和效果,同时也使它靠附于政权,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但客观而言,晏阳初的平教会并未完全处于“站在政府的立场来改造人民”的位置。

①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印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二十五年度工作概览》,1936年10月,第8—10页。

② 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页。

就政府方面来说,从中上层的政治层面来看,平教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被网罗进政权中。晏阳初参加了国民参政会,既是乡村建设派领袖,又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活动家,并以这两种身份穿梭于各种场合。其他平教会骨干人物,如陈筑山出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瞿菊农出任湖南实验县政委员会委员,霍六丁出任江西第八行政区专员,孙廉泉出任四川第三行政区专员,彭一湖出任衡山实验县县长、陈开泗出任四川新都实验县县长,等等。这些民间团体精英的加盟,无论在国民政府的民主象征方面,还是在政治实践方面,都有利于国民党统治。在基层政治实践层面,“战前政府对于乡建,也是和一般学术机关、人民团体一样举办几处实验区,或由各省设立实验县。自新县制实施之后,乡建工作遂与县政建设打成一片,变成了县单位的建设,而且因为是政府主持的,当然普遍到全国”。^①与政权紧密结合的乡村建设运动,使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和政治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行政权深入到乡镇,乡镇行政官僚化,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施政能力;保甲体制发生了变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此外对乡村社会的绅权、族权和农会等组织都产生很大影响。^②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境况下,国民党政权试图将多种力量、资源整合进体制内,以强化自己执政能力。

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目前学术界一般是在肯定其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认定是失败的,并把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其改良性质(即未触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未改变封建土地

① 傅葆琛:《乡建总检讨》,《华西乡建》第1卷第1、2—3、4—5期,1947年1、2、3月。

② 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5—204页。

所有制), 和直接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① 笔者从对在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四川等地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其他的个案考察和分析中, 认为这结论值得重审和反思^②, 从地域空间维度来看, 日本的入侵, 确实使许多乡村建设运动陷于停止, 确实缩小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地域, 但许多未沦陷的地方还在继续。^③ 农民问题是近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 时至今日, 三农问题依然严峻, 更何况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形成社会运动, 充其量就是短短的十来年时间, 用十来年时间试图解决要用数十年, 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才能解决的问题, 是后人对前人的苛求, 是“非历史”的思维偏见, 存在着时间维度的错位。

- ① 有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著基本均持这一观点, 可查阅徐有礼:《论三十年代宛西乡建运动的理论依据》, 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8年第3期; 郭晓平:《30年代宛西乡村建设中的体制改良》, 载《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派》, 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第523—559页。
- ② 除此之外, 笔者还对其他一些乡建个案做了考察, 可参阅李在全:《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以福建协和大学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载《教育学报》2005年第6期, 也认为原先的定论值得省思。江西方面的个案见游海华:《早期农村现代化的有益探索——民国江西万家埠实验区研究》, 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 ③ 例如, 卢作孚领导的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就继续进行, 并在这时期获得很大的发展, 可参见王安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 《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5期; 刘重来:《论卢作孚乡村建设之路》,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8年第4期; 郭剑鸣:《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时期乡建模式的比较》,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3年第5期。金陵大学在抗战爆发后, 在四川、陕西等地继续乡村建设实验, 可参阅夏军:《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乡村建设运动》, 载于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等等。此外, 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是, 在全民族抗战的宏大潮流中, 会造成一些原先颇有声势和影响的潮流被掩盖、潜藏、变小甚至失语, 这是研究抗战爆发后乡村建设运动变化必须考虑的。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确实是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取和平方式,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改善公共卫生以及移风易俗等改良措施,复兴日趋衰败的农村社会经济,实现“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乡村建设者们为什么采取改良方式来解决农村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既有他们个人世界观、社会观、人生价值观和改造社会方法论的原因,也有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过多的强调是改良性质导致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其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倾向:为什么乡村建设者们不采取革命方式改造中国、建设农村呢?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是一种强加式的思维。其实在当时的情景下^①,采用改良方式,实实在在的为农村做些工作,推进乡村建设,已经是这些乡村建设者们所能采取的较好的手段和方式了。不可否认,改良方式使乡村建设运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若深入细致地研究可以发现,其实这种改良方式,使得农村中国家和社会、传统与现代、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大众等诸多因素和资源得以较好的互动、整合、利用和优化。在上述的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四川等地的乡村建设活动中,许多措施都可以证明这点。如果摆脱“革命”和“改良”这样两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话语分析,我们会发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的大方向和实践内容是符合农村现代化规律和历史潮流的。

(作者李在全: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

游海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这种情景既包括外部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也包括乡村建设者们自身有限的资源和能量。